

# 端午节研究的历史回顾

## ——《中国端午节·研究卷》前言

刘晓峰

自古以来，端午节就是中国人时间生活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尚秉和先生在《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中指出，在清朝，端午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三个节日之一，和中秋、岁首并称三节。在当代中国人的时间生活中，端午节也是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2007年国家颁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调整方案”，将端午节与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编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中。2009年端午节更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端午是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俗传承、深远历史影响的节日。古人在端午日炼剑、炼镜、采药、晒药、制药；在端午日浴兰汤、饮雄黄酒、菖蒲酒、艾酒，在端午节插艾叶、挂雄黄袋、焚避瘟丹；在端午日制艾人、艾虎、蒲人、蒲葫芦为饰，制蒲剑、蓬鞭、蒜拳、桃枝于床边；在端午日挂虎饰、穿老虎兜肚、穿五毒衣、系五色丝、戴五色花纸，在门前系朱索、贴五毒符、贴张天师像、钟馗像，采用钉赤口等方法避毒与辟邪，此外还有斗百草、斗力、厮打、拔河、决射、龙舟、打石头仗等等名目众多的节俗活动。在这些节俗活动背后，则蕴含着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的特点，我们民族行为方式的特点。所以，深入研究这一节日，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认识世界，对于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着非常重要的文化意义。

### 一、从信古到疑古

真正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端午节研究起自20世纪30年代。而端午节研究历史上最经典的开山之作，是江绍原1926年发表的《端午竞渡本意考》[1]。一如论文标题所示，这篇论文的主题围绕着端午龙舟竞渡习俗的起源。不论在什么时代，节日起源永远是节日研究中最核心最热门的话题。端午节进入现代知识体系后，节日起源问题便作为核心话题一直被讨论。而因为端午节是“复合型”节日，其节俗与中国古代文化诸多层面都牵涉极深，因此在节日起源问题上，就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逻辑地推想这一讨论还会继续很多年。在《端午竞渡本意考》中，江绍原追问：“竞渡是吊屈原吗？”“端午竞渡的起源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就充满了时代性。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拿在“五四”运动发生的1919年刘长寿所发表的《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合论》一文略作对读。刘长寿文章所关注的问题是，他“读史记田文屈原列传”，发现屈原和田文同样生于五月五日，但是“迄今更数千百年。披荆楚岁时之记。沿角黍竞渡之俗。凡一切风景节物。皆以吊屈原汨罗之死。而于田文之生于是日。则若或知之。或不知之。曾不少注意焉？”为什么会这样？刘长寿给出的结论是“鸡鸣狗盗之奸雄。与被荔纫兰之忠彦。其人格之相去。固不可以道里计”，而“公论自在人心。直道长存天壤”。由此刘长寿期待“世有爱国之英。闻屈原之流风。其亦可以愀然悲奋然起矣”[2]。从文章学角度看，这篇只有千五百字的文章议论跌宕起伏，廻环有致，曲终奏雅，足见作者是文章高手。然而刘长寿“读史记田文屈原列传”之时，端午竞渡是否为了悼念屈原，这一为江绍原所追问的问题却很明显还根本没有成为问题。

现代学术体系在中国的展开过程，是以全新的眼光和方法对于古代的文化与思想加以分析、研究和发掘的过程。一如顾颉刚“四个打破”所指出的那样，新的知识体系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3]，概而言之，所有固有的观念都要打破，旧有的知识体系都要经历疑古的时代浪潮无情地冲洗。

江绍原是中国民间俗信研究的奠基人。从个人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中国民间的各种俗信是江绍原关注的核心对象。江绍原早年留学美国时接受过综合的现代学术训练。他利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宗教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梳理中国社会的俗信文化，从看似零碎的有关头发、胡子、指甲等方面的俗信之中，找到文化内在的发展脉络。置根民族文化土壤，利用现代学术工具，是他学术上最鲜明的两个侧面。《端午竞渡本意考》所用史料并不稀见，正如文中他自己交代所说，几乎全是《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的“仲夏部”和“端午部”里面的，另外只参考了《五杂俎》(明人谢肇淛撰，“天部二”)和《湖北通志》(卷二十一，“风俗”门“岁时”部)，但它是一篇以现代学术目光追问端午节起源的论文。文中提出“竞渡起于送灾”，“是一种用法术处理的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思路，在今天的端午起源诸说中依旧雄踞一方。而从饱含新文化到来的时代气息角度看，在研究方法论上有开创性意义。这篇论文是端午节研究历史上的开山之作，拥有不可动摇的权威历史地位。

20世纪30—40年代，有许多学者上承江绍原的问题意识对端午节起源问题加以追索。如杨霁云《端午风俗之起源及其嬗变》[4]、欧阳飞云的《端午“恶日”考》[5]等。这些文章或试图多层面历史地揭示端午的形成过程，或以“恶日”为端午起源的核心，多种角度求证。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端午节的资料积累和研究，也都有了很长足的进步。张清水《杂谈端阳节的古俗及其他》[6]辑录了《月令粹编》中有关端午古俗的资料；徐中玉《端午民俗考》[7]从沐浴、采药、采艾、蹋百草、续命缕、作赤灵符、角黍——粽子、竞渡、不发火、蒲酒、艾酒、戴艾虎、画天师、菹龟、百戏、散乐游玩等多方面对端午节的节俗做出考订；胡张政《漳州比赛龙舟的风俗及故事》[8]从田野到文献，对漳州地方端午民俗做了资料收集。专题研究方面，代表性论文有黄石的《角黍考略》[9]。这篇论文按照发展的三个时期，对于粽子这一最具有代表性的端午节食做了细致分析，在大量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极尽剥丝抽茧之功逼近历史真相，从这篇论文中已经看得到作者后来所著《端午礼俗史》的风范。

## 二、端午研究领域的救亡与启蒙

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归纳现代中国思想发展，指出“五四”运动包含两个性质不相同的运动，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学生爱国反帝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他对于“救亡”与“启蒙”这两个关键词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展开的叙述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受到历史发展条件的影响，在“五四”以后的中国，“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文化运动很容易被政治运动所左右，救亡很容易压倒启蒙。知识分子在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传统思想影响下，会出现舍文化而取政治的情况[10]。这是对1919年以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非常深刻的概括。在端午节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一个与这一大的历史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学术发展脉络，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屈原传说是中国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端午起源说法，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一提起端午节，最流行的回答依旧是纪念屈原。屈原传说的影响长期处于一枝独秀的状态并非偶然。它首先与这一传说本身结构的经典性有关。排列比较一下附会于古代一年中节日上的众多节日起源谭，可以看出端午节屈原传说在结构上是最经典的。我们看这个传说非常成功地把五月节日已经存在的两个最主流要素——龙舟与粽子，非常完美地结合到了屈原传说中。悼屈、竞渡、粽子这三个部分巧妙地结合到一起，分别对节日文化所最需要的主题、形式、节食给予了非常圆满的回答，节日传说结构之完美，是其他节俗起源谭很少做到的，难怪闻一多要惊叹“说端午节起于纪念屈原，我佩服他那无上的智慧！”加上在节日主题上悼屈之立意高远，传说的主人公屈原本身，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和意义。屈原拥有美政理想，即使被流放也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最终选择怀石沉江。

这种忠于家国的精神在那个天下有才能的人为寻找赏识自己的君主而奔走的时代是罕见的。这份爱国精神，感动了古往今来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一个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非常需要屈原的这种爱国精神。这也是民国以来屈原的诗词一直散见于中小学教科书的缘故。“五四”运动之后，端午节研究已经在“打破”与“疑古”的道路上走出了很远的路程，但这些学术进步基本上没有改变对端午节单一的解释方向，由端午节、屈原传说、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组合形态相当长时期一直占据了主流，并且出现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事件——抗战期间的诗人节。

1941年5月30日端午节，第一届诗人节开得极为正式隆重。纪念活动由老舍主持，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梁寒操、冯玉祥将军等均临会。诗人节纪念大会的内容也很丰富，有画家李可染画的屈子像，由郭沫若给题词；有著名提琴家马思聪谱曲的《云中君》；有方殷作词王云阶制谱的《汨罗江上》……[11]发起改造端午节为诗人节，是1940年6月10日(端午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的纪念屈原的诗歌朗诵会上。当时有人提议以每年的端午为中国的诗人节，而郭沫若和老舍是诗人节最重要的两个发案者。所以郭沫若当年在重庆发表的关于诗人节起源的文章就有着权威诠释的意味：“抗战以来，由于国家临到了相当危险的关头，屈原的身世和作品又唤起了人们的注意。端午节的意义因而也更被重视了。特别在今年，有好些做诗的人竟把这个节日定名为‘诗人节’。”[12]一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诗人节是一个独特的节日。说独特，首先是因为这是对一个中国传统节日的改造而来。而且，不象其它的大众节日，诗人节是多少带有文学家和上流人士雅集性质的节日。有特别的对诗人文学家们的某些期许之意。其次，这个节日是对中国传统民间节日端午节的改造，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肯定。其三，诗人节引出过非常激烈的争论。1944年的诗人节纪念期间，由孙次舟等学者由诗人节引出屈原问题的争论。”[13]省略掉诗人节大会内部的复杂党派关系与政治角力，从大的历史背景回首改造端午节为诗人节这段往事，足以让我们体认到救亡的力量怎样覆盖了启蒙的旋律。而诗人节所引起的争论，其实也不仅仅限于屈原问题，它内涵着以农历五月五日为代表的传统节日的存废问题，内涵着民国以来中国传统时间文化体系的生存权利问题[14]。

“诗人节”关于屈原的争论在楚辞研究大家闻一多那里，唤起的是对端午节起源真相加以认真追究的冲动和愿望。“端午那天孩子们问起粽子的起源，我当时虽乘机大讲了一顿屈原，心里却在暗笑，恐怕是帮同古人撒谎罢。不知道是为了谎的教育价值，还是自己图省事和藏拙，反正谎是撒过了，并且相当成功，因为看来孩子们的好奇心确乎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可是，孩子们好奇心的终点，便是自己好奇心的起点。自从那天起，心里常常转着一个念头：如果不相信谎，真又是甚么呢？端午真正的起源，究竟有没有法子知道呢？”[15]这一冲动和愿望最后凝聚为《端午考》这篇没有最后完成的大作。闻一多学术的谱系渊源中，文化人类学家对于图腾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图腾(totem)是原始时代民族的重要标志。原始民族经常视某种自然物和本民族有某种特殊的亲缘关系，并进而赋予其突出地位并崇拜之。闻一多利用文化人类学家通过图腾解读原始文化的方法，对于中国古代典籍进行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闻一多指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崇拜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最初假定龙是自己祖宗，自己便是“龙子”，是“龙子”便有“龙性”，便装扮成“龙形”，最后愈看愈像龙，愈想愈是龙，于是自己果然是龙。他认为我们的民族历史上曾经存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图腾主义的心理发展过程[16]。沿着龙图腾研究的线索，闻一多展开自己的端午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端午本是以龙为图腾的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很明显，闻一多把端午研究的焦点再度拉回到对历史真相的追索。

20世纪60—70年代，国内学界万马齐喑，端午节研究也处于停歇期，乏善可陈。这一阶段端午研究最突出的成就，集中在海外。1963年香港泰兴书局出版了《端午礼俗史》。该书作者黄石，是一位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值得认真解读的优秀学者。赵世瑜评价他是“广泛阅读国外人类学、民族志和民俗学著作”，拥有职业民俗学家的特点[17]。从《端午节俗史》一书可以看出他对于中国古典文献非常熟悉，同时好学深思，非常善于排比史料，找出各种史料内部的逻辑线索，可谓学力非常深厚。这本书是我所寓目的研究端午节著作中水平最高的一种。我给予这本书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这部著作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整体背景之中，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化“应天顺时”的思想观念之上，面对不断处于阴阳循环转变世界，从采取“应”与“顺”的立场出发，围绕端午节礼俗做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彻底梳理。这样的规模、这样的深度、这样体系化的解读，不仅在当时是“前不见古人”的，而且即便在今天，在端午节已经进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每年以端午节为关键词的学术论文会数以百计的今天，依旧还是“后不见来者”的。黄石之后，有台湾学者李亦园撰写论文《端午与屈原——神话与仪式的结构关系再探》[18]。李亦园毕业于哈佛大学，主修人类学。他善于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神话，致力于在传统中国宇宙观与现实中国社会之间建立联系。《端午与屈原》一文与他此前完成的另一篇论文《寒食与介子推——一则中国古代神话与仪式的结构学研究》是姊妹篇。在这两篇论文中，李亦园从结构主义理论出发，努力挖掘仪式与传说的深层结构关系。他把寒食节介子推之于火和端午节屈原之于水的关联加以对比，进而论证表面层次上是被任选撮合的传说与仪式，能“脱颖”于其他可能案例而普遍流行于民间，是因为背后有必然性结构因素。这篇论文摆脱了对节日起源谭单独进行史料钩沉的传统研究模式，注重在不同节日的传说与仪式之间寻找内在结构性因素，从方法论上是非常有开创性意义的。

### 三、新时期以后的端午研究

农历五月初五日，是中国民间传统的端午节，是纪念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的日子。这不但在国内，而且在东南亚，甚至远隔重洋的日本，都成了定论。为什么还要重新考证呢？[19]

这是龙文玉1981年发表《端午节新考》的开篇段落。从江绍原发表论文讨论端午起源算起近六十年后，在当时的学界端午节与屈原的联系反而成了“世界性”的定论，以至于写作一篇介绍少数民族端午节俗的论文，要先这样宕一笔为自己找个立足点。

然而一个新的大时代已经到来。端午节的研究也命中注定要迎接一个全盛的历史时期。伴随国家经济发展，人们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不断提高，包括端午节在内的节日文化研究，也出现了不断深化的趋势。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民众生活研究的一部分，端午节的研究成果积累颇多。从研究趋势而言，整个新时期以来的节日研究可以韩国申遗江陵端午祭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划时期的历史事件。因为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从2004年媒体开始聚焦韩国将以端午申遗，到2007年我国颁布的“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调整方案”，将端午节与清明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编入国家法定节假日制度中，再到2009年端午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入选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传统节日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经历了一个重新确立地位的过程。这也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突飞猛进的历史时期，包括端午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研究由此进入了全新阶段。

节日在这一阶段被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文化传统的代表”等符号意义。政府、学者、民众的共同参与，带来行政力量、媒体宣传、多学科知识的积极介入，构成全新的多声部

合唱。节日研究的规模也空前强大起来。在中国知网以端午节为关键词检索，20世纪80年代到1993年，相关研究在10—20篇前后；1994—2003年，基本维持在30—50篇前后；2004—2006年，一跃升至70篇以上；而从2007年开始进入每年上百篇，2012年最多，为183篇。尽管研究的深入与否和论文数量多寡无关，但我们还是可以从论文的大量出现，看出社会对端午节研究的整体重视程度的变化。从2005年开始，出现以端午节为关键词的硕博论文，到2012年，这类论文已多达三十余篇。其中2007年中央民族大学宋颖博士提交的《端午节研究：传统、国家与文化表达》最为引人注目。这篇博士论文是从民俗学视角对端午节进行的专题研究。作者娴熟于古典文献，同时注重实地调查和个案分析，对于西方的符号学理论、民俗学理论也有很好的掌握，是新世纪有关端午节研究的重要成果。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后，端午节研究进入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期。整体上看这段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可圈可点。

首先是研究者们研究视野空前开阔。改革开放后，中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国外的各种学说被迅速介绍进来，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古代琉球、越南、东南亚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端午习俗也纷纷被介绍进来，这一切为端午研究者提供了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与此相关联的是这一时期研究的思路也非常活跃。从文献到田野、从少数民族的节俗到都市新俗，整个端午节研究的论文选题开始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推进的局面。

其次是端午节研究越来越与现实社会发展密切结合到一起。作为“非遗”的代表、作为国家法定假日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端午节在当代中国的地位空前提高，这也吸引了不同科的不少学者参与介入到端午节研究中，有关端午的研究领域由此也被大大扩宽。诸如端午节与现代化的关系、与国家文化保护政策的关系、与地域文化建设的关系、与旅游资源开发的关系，乃至端午节节日休闲行为特征等等课题，都有学者撰文专门讨论。

其三是端午研究的专题化、深入化。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有的论文针对某一特殊区域端午文化展开田野调查，有的论文对端午某一特殊事项进行深入考证，也有论文对历史上某一朝代端午习俗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从研究队伍来看，投身于节日研究的学者，囊括了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老中青三代学人。这些研究者们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州之玉。在他们几十年的奋斗和努力下，端午节研究可以说已经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局面。立足今天，回顾近百年的端午研究，今夕之慨，油然而生。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编选原则。本书的编辑目的在于反映近百年端午节研究的发展状况，所以在选编方面采取前宽后严的原则，对民国时期的文章入选标准放宽。对于入选文章，采取尊重历史的基本态度，除对原文中部分明显的错植、误植略加调整外，许多与今天的行文、标点不同的部分一仍其旧。需要申明的是，近百年来的端午研究，学术积累可谓汗牛充栋，这里我们所选出的，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论文集篇幅所限，加之笔者识见所囿，沧海遗珠，在所难免。每念及此，抱歉不已。

2013年5月

注释：

1 江绍原：《端午竞渡本意考》，载《晨报副镌》，1926年2月10日、2月11日、2月20日。

- 2 刘长寿：《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屈原以五月五日死合论》，载《广益杂志》，1919年，第11期。
- 3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载《古史辨》第1册,1926年，第101页。
- 4 杨霁云：《端午风俗之起源及其嬗变》，载《学生文艺丛刊》，1934年，第7卷，第3期。
- 5 欧阳飞云：《端午“恶日”考》，载《逸经》，1937年，第25-26期。
- 6 清水：《杂谈端午节的古俗及其他》，载《民俗》周刊，1929年，第71期。
- 7 徐中玉：《端午民俗考》，载《国闻周报》，1936年，第13卷，第25期。
- 8 胡张政：《漳州比赛龙舟的风俗及故事》，载《民俗》，1928年，第21-22期。
- 9 黄石：《角黍考略》，载《东方杂志》，1933年，第30卷，第12号。
- 10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7-45页。
- 11 老舍：《第一届诗人节》，载《宇宙风》，1942年，第119-120期。
- 12 郭沫若：《蒲剑·龙船·鲤帜》，载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5月31日。
- 13 参见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01期。
- 14 柳亚子：《纪念诗人节》，载《文学创作》，1944年，第3卷，第1期。
- 15 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五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6 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7 赵世瑜：《黄石民俗学论集序》，载《黄石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 18 李亦园：《宗教与神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303-321页。
- 19 龙文玉：《端午节新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二期。